

日本后“9·11”小说的越境变奏： 书写他者与他者书写

杨洪俊,王维娜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日本后“9·11”小说自创作之始便带有他者特性。在创作者层面,其立于与“9·11”事件、反恐战争及事件中心地保持一定距离的他者之境,书写立场相对客观;从关注对象而言,不再局限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群体,关注更多关联主体;在人物塑造层面,聚焦普通“小人物”群体,而非英雄、恐怖分子等事件中心人物。作品以差异性他者、边缘性他者和非人化他者的视角,书写恐袭事件及其深远影响,展现恐怖、暴力与战争之下他者的困境,给予事件中被忽视和遗忘的他者群体发声机会,呈现书写他者与他者书写中“他者”认知、话语与意涵的多重越境变奏。

关键词:日本后“9·11”小说;他者;差异性;边缘性;非人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4-0064-06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该事件“所产生的震撼波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阻碍,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的共同记忆”^①,且随着全球各类恐怖事件的发生,“9·11”事件的影响仍在不断蔓延和深入。而对“9·11”事件做出反应的后“9·11”文学也从最初单一的西方本土创作,发展出包括穆斯林流散作家的英语文学创作、阿拉伯本土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以及日本等身为事件“他者”而进行的日语文学创作。多样化和多类型的后“9·11”文学及其研究,有助于世人多维度、更全面地认识恐怖袭击及反恐战争,使世人更加深刻、客观地思考恐怖与暴力、民族差异与人类命运等问题。研究后“9·11”文学“不能仅把视野局限在美国,而应该放眼世界,了解其他国家文学怎样反观‘9·11’事件及其文学表现”^②。然而,目前后“9·11”文学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美国本土创作作品上,近些年出现了少数对阿拉伯本土创作作品的研究,但是对日本相关作品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关注。

日本地处远离“9·11”事件中心的物理空间,且非直接相关的第三者,由于存在“与表现对象之间的空间距离”^③,对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日本文坛作家一定程度上在少有外在因素干预的、近似“零度写作”状态下,以自身的独特视角进行相关创作,以一种更客观的视角去看待、揭示、反思“9·11”事件及其造成的影响,是一种降低“主体介入”的他者性创作。他者性“主要是由于地域特性(以及因这种地域特性所导致的文学特性)所铸就”^④,因此,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日本后“9·11”小说具有天然的他者特性,可以透过更理性、客观的他者视角向世人重现“9·11”、进行历史观照、探讨其现实意义。这也

收稿日期:2024-12-1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3SJZD088)

作者简介:杨洪俊(1980—),男,山东莒县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①张和龙:《“9·11文学”:新世纪美英文学的审美转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②杨金才:《关于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外国文学动态》2013年第3期。

③罗琼:《另类9/11书写》,《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④刘俊:《“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许会是麦克·罗斯伯格期望看到的注重“国际关系及疆界外公民身份”^①的小说。当然,受制于作家的身份与环境,日本后“9·11”小说对美国及穆斯林群体、社会等方面的描写不及其本土作家般细腻、深刻,加之日语创作,其推广度、影响力也受到一定制约。但日本后“9·11”小说不同于鲜少将目光置于美国以外“他者”的西方主流作品,可以“从异化他者的二元叙事中跳脱出来”^②,凭借其独特的双重视角选择那些目前尚未或极少被选择的主题进行揭示,对尚未或极少被选择的他者进行描写,弥补了西方主流后“9·11”文学作品某种程度上对他者关注的缺失,为被忽视的他者提供了发声渠道。

美籍日本文学创作者利比·英雄的《破碎支离万千像》、旅日伊朗作家席琳·内泽玛菲的《和平》以及日本本土作家米原万里的《巴格达的擦鞋工》是日本后“9·11”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三部作品呈现了作家身份的丰富性、视野的开阔性及角度的多维性。《破碎支离万千像》以“9·11”事件为创作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搭乘飞机去往美国,却因恐怖袭击的发生而不得不短暂滞留加拿大期间发生的故事。《和平》以阿富汗民族纷争、“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为创作背景,故事中的“我”作为阿富汗少女蕾拉实现难民认定的兼职口译逐渐了解到蕾拉及其家人的悲惨经历、阿富汗在“9·11”事件前后的民族纷乱和战争灾难。《巴格达的擦鞋工》以伊拉克战争为创作背景,以一位居住在巴格达的擦鞋匠少年的口吻,讲述了主人公在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后相继失去所有家人而最终成为瘸腿孤儿的悲惨故事。三部作品中,作者关注族裔及政治立场差异,体会不同他者的悲惨境遇,给予不同他者发声的机会,在刻画恐怖袭击与反恐战争中生命的微小与脆弱的同时,引导读者深入思考文明冲突化解与民族身份构建的可能路径。

一、差异性他者:“他者”的认知变奏

无论从历史根源追溯还是从现实因素考察,穆斯林之于美国一直作为差异性他者而存在。他者“往往是指二元对立中具有边缘性和差异性因素的一方”^③。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双方由于宗教及文化冲突、政治及区域利益纠纷、军事冲突等,早已形成了仇视和对抗的局面,美国通过主流叙事对穆斯林他者形象进行了想象和创造,这也致使其国人“从骨子里对伊斯兰文明有着偏见和蔑视”^④。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实行霸权主义与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⑤,伊斯兰极端分子对美国及其所宣扬的文明、施行的霸权主义和全球化进行反拨,以撞击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纽约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来表达他们的异议、不满和愤恨,促使世人对发生的一切进行深思。然而这一极端行为给美国带去混乱和不安、给全世界带来强大冲击的同时,也激起了美国更大的怒意,进而导致阿富汗和伊拉克遭受更深重的战争灾难。

“9·11”恐怖袭击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到的首次外来攻击,带给美国及其国民的冲击之大不言而喻。该事件不仅引发了美国国民恐慌、不安与悲痛,也打碎了美国国民以往的骄傲,并将其民众置于不知何时会遭遇恐怖袭击的担忧之中。而这种或遭恐袭的不安也蔓延至世界各地,使全世界陷入一种高度警戒的状态。《破碎支离万千像》中,主人公在与母亲通电话时,母亲多次提醒他当心外国人,其话语反映了一向骄傲并提倡多元文化的美国人在遭受恐怖袭击后内心安全感的丧失和戒备心理,以及将外国人尤其阿拉伯人进一步他者化的心态。《和平》一文则透露出整个世界对穆斯林及阿拉伯移民/难民的反感和警戒,由于“9·11”事件的发生,得以暂时假释的阿富汗少女蕾拉和其他阿富汗难民突然被再次拘留,在日阿富汗人也被入境管理局传唤调查。因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这一群体被置于美国乃至全世界严厉审视的目光之下,尽管并无过错,却要遭受来自全世界的差异性他者对待。

“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反恐、反穆斯林情绪急剧上涨,对穆斯林、阿拉伯移民和阿拉伯裔美国人

^①Rothberg, Michael. “A Failure of the Imagination: Diagnosing the Post-9/11 Novel :A Response to Richard Gra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09, 21(1): 153.

^②王翔敏:《他者的影像逆袭:后“9·11”电影〈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长春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

^③胡亚敏,肖祥:《“他者”的多副面孔》,《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④王庆奖,苏前辉,等:《冲突、创伤与巨变——美国“9·11”小说作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⑤张和龙:《“9·11文学”:新世纪美英文学的审美转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的排斥和差别对待迅速扩大,甚至发生仇恨犯罪事件。遭受责难和迫害的穆斯林被逼入困境,他们遭受这些他者性对待的直接原因虽在于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但“进行新闻报道的主流媒体叙事和意识形态浓厚的官方叙事”^①在渲染国民情绪和引导国民意识方面则对生发这类恶性事件起到了极大催化作用。

《破碎支离万千像》与《和平》两部作品中,多次出现电视中反复播报的飞机冲入大厦、火焰熊熊燃烧、烟尘四处弥漫的景象,这些场景正是对美国国民当下愤怒和悲伤情感的利用。主流叙事通过电视“反复强调美国‘无辜受害者’这一形象”^②,极力渲染悲伤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最终“成为一种视觉上的主控叙述”^③。“总统的脸淡出画面,映出一个瘦削男人的细长脸庞,还有那似倒圆锥形的长长络腮胡,播音员‘这就是嫌疑犯’的声音也传了出来”^④,主流叙事通过反复播放展示恐怖分子形象的场面,使得“恐怖分子”这一他者形象泛化至整个穆斯林群体。“他者的形象就其初始形式而言都是具象的……在传播过程中……渐渐获得了极强的隐喻性和象征意味,具象由此开始泛化,进而演变为类象”^⑤。正是由于极具选择性和引导性的报道,“恐怖分子”这一他者具象泛化成了穆斯林这一他者类象。在悲伤主义之下,美国国民逐渐将两者混为一谈,对穆斯林的厌恶和愤恨也不断扩大,由此穆斯林群体便作为对立的他者,在被极度丑化和妖魔化后深入美国国民的集体认知。

主流叙事在恶化他者形象引起美国国民愤怒及憎恶的同时,大肆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将自身的价值正向化,使之以美好的幻象形式呈现出来”^⑥。在《破碎支离万千像》和小林纪晴的《泰式酸辣汤》中,主人公眼中的媒体皆是以正面化、英雄化的方式对警察、消防人员、美国士兵、志愿者等形象进行传播报道,这与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邪恶他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塑造出差异性的对立形象,“形成‘我们’对‘他们’、善对恶、西方对东方、民主对恐怖主义等二元对立的西方中心叙事”^⑦。而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不仅会使反恐战争获得正义和正当的名头,还“阻断了对话与相互理解的可能性”^⑧,成为不断引发暴力和战争的潜在源头。

“9·11”事件在令美国国民对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徒产生愤怒和厌恶的同时,也使部分美国人对阿拉伯人产生了新的认识。“阿拉伯人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愚蠢”,一直被视为愚昧、落后的穆斯林群体,通过“9·11”事件引起了部分美国人的注意,美国人认识到被视为他者的阿拉伯人并非如自己心中所想。他们不仅会操纵代表着“文明和科技”的飞机,还敢对强大的美国进行冲撞和对抗,这在颠覆美国人固有认知、令其震惊的同时,使其开始反思恐怖袭击发生的原因、反省美国的所作所为,并认识到“我们比自己所意识到的还要令人讨厌”、“因为我们欺负阿拉伯才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作为差异性他者的穆斯林群体,其形象在日本后“9·11”文学中出现多元化变奏,虽然这一变化的呈现并不强烈,但为反观“9·11”事件及立体、客观地认识事件的缘起提供了新的文学视角。

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使部分伊斯兰世界成为美国的差异性他者,而“9·11”事件的发生不仅使穆斯林遭受他者性的区别对待,还导致恶之他者形象的泛化和差异性对立形象的深度塑造,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美国人对穆斯林以往的他者印象。日本后“9·11”小说通过对差异性他者进行描写,一改欧美后“9·11”文学对美国群体及其所受创伤的重点关注,使世人同样看到广大穆斯林群体的困境及所遭受的他者性对待,丰富了“9·11”事件后穆斯林的形象塑造以及深化了对这一他者的认识。

①王薇:《同质见证与异质记忆:美国“9·11”小说的两次“言说”》,《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

②张瑞华:《9/11反叙事: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③曾艳钰:《约翰·厄普代克小说〈恐怖分子〉中的他者叙述与主体建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④浅田次郎など監修:『コレクション 戰争と文学 4 9·11 变容する戦争』,集英社 2011 年版,第 59 頁。作为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的三部作品均收录于该作品集中,后文出自该作品集的引文,不再另注。

⑤张月:《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⑥张月:《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⑦张瑞华:《9/11反叙事: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⑧新妻絢:「二項対立的言説に抗するエドワード・サイードのヒューマニズム的批判 — 2001年アメリカ同時多発テロ以降のアメリカ批判を通じて—」,《時事英語学研究》2006年第45号,第33頁。

二、边缘性他者:“他者”的话语变奏

欧美后“9·11”文学多将视角置于“9·11”事件的中心人物,而日本后“9·11”小说则多选择凝视众多不同的边缘性他者,以更多维、更全面的角度认识不同主体的遭遇、体会被遗忘之人内心的真切诉求,使被忽视的群体获得表达路径。“他者往往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语权。”^①但边缘并非等同于不重要、无意义,相反,它能够凭借自身的独特视角给予世人更多启示和思考。

日本后“9·11”小说多设定具备双重他者视角的人物,这类人物主要担当故事讲述者或倾听者的角色,由于身份和空间特性,又皆具边缘属性。《破碎支离万千像》中作为故事讲述者的主人公爱德华美国人却长年留居日本,“身体上的位移”带来“语言和文化土壤的改变”^②,他逐渐视美国的家人为“那边”的人,表现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母国的疏离。“9·11”事件发生时,过境加拿大的他并未置身于恐袭灾难的中心地,因而可保持一定距离凝视该事件及其带来的纷乱,因此不论从其身份——虽为美国人,却对美国抱有疏离感,也非属穆斯林一派,还是恐怖袭击发生时与事件所间隔的距离来说,作为讲述者的他始终作为他者而存在,处于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和平》中的故事讲述者是在日伊朗留学生“我”,同样不论在身份——非美国人、非阿富汗人,还是从对恐怖袭击和阿富汗战争及事件发生地保持一定距离而言,皆属于边缘性的他者。《巴格达的擦鞋工》中的故事倾听者为伊拉克战争中的日本战地记者,该作中倾听者亦在身份上具有他者的边缘属性。由于日本后“9·11”小说自身所具有的他者特性,该类作品中多存在作为边缘性他者的讲述者或倾听者。他们以双重他者视角凝视和认识恐怖袭击与反恐战争,以及事件给“风暴中心”的人们带去的灾难、混乱和创伤,并记录和见证人类历史的磨难。

边缘性他者的故事讲述者或倾听者,对于“9·11”事件及其带来的后续影响和灾难几乎都是从电视、报纸、电话、他人之口等第三方媒介获得,而信息获得方式也进一步验证其边缘属性。尽管作为边缘性他者,只能通过间接方式了解和见证恐怖袭击及反恐战争,但也难逃压抑与悲伤。《破碎支离万千像》中,爱德华在恐怖袭击相关信息的包围下,一直处于不安、茫然、失眠的状态;《和平》中,故事讲述者表达道“我不明白,但却无法抑制溢出的眼泪,如同陷入呼吸困难般的这时断时续的气息是我的吗?”,在得知和见证了阿富汗少女及其家人的悲惨遭遇以及阿富汗因民族纠纷和战乱化为人间地狱之后,她无法避免那随着间接见证而来的悲痛和创伤;《巴格达的擦鞋工》中,听完主人公的悲惨故事,倾听者难免为之伤心哭泣。作为边缘性的他者,尽管与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这两大中心事件持有一定距离,也未影响其对中心事件的认知及相应情感的产生。

作品中的主人公亦为边缘性他者的存在,他们或失去现实之家,或失去心灵归宿之地而成为没有归属的无根之人。《破碎支离万千像》中的主人公爱德华,“不顾双亲的反对,定居东京。定居后不管过了多久,都不被周围视作‘这边’的人,而美国的家人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那边’的人”,以及当主人公的母亲提醒他注意外国人时,他认为自己“二十年前去到日本,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主人公在日本被视为“他者”不被日本社会所接纳,而对于美国又抱有疏离感,便成了“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存在”^③,这使他陷入没有心灵归属的尴尬境地,而这种出于文化、社会和心灵方面的漂浮感和不认同感决定了主人公的边缘性他者属性。《和平》中,身为难民的主人公蕾拉辗转栖身于拘留所和教会,其原本的家园早已在阿富汗那巴别塔般的混乱和纠纷中消失不见,失去具有归属感的现实之家,她不得不作为边缘性他者漂泊于异国他乡。《巴格达的擦鞋工》中的主人公艾哈迈德家的房屋因美国导弹偏离原定目标而被炸毁,在亲人皆因战乱离世后,他只能居于孤儿院。伊拉克战乱下,身为瘸腿孤儿的他是难以被人关注到的渺小而又边缘化的他者。在恐袭与战争的环境下,身为边缘性他者的主人公是鲜少被世人的目光注视到的、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因此对于他们的经历和遭遇世人也鲜少得知,而日本后“9·11”小说将目光投向这些边缘性他

^①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②齐园:《后殖民背景下的“异质文化形象”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③柴田勝二:「テロリズムと私小説——リーピ英雄の表現と『千々にくだけて』」,『総合文化研究』2014年第18号,第41頁。

者,为他们提供发声的权利,并为他们创造出获得关注和认识的机会。

日本后“9·11”小说中无论是具有双重视角的故事讲述者或倾听者,还是故事中的主人公,皆作为边缘性他者而存在,前者之于后者的凝视和见证,构成了他者对于另一他者的凝视和见证,前一他者是相对客观和公正的存在,而另一他者是被忽视和遗忘的群体,通过前者的关注和见证,后者得以被看见而获得了发声的机会。

三、非人化他者:“他者”的意涵变奏

他者于特殊情境下往往也展现出非人化属性。“非人化处理比简单地称敌人为‘蟑螂’或者什么别的东西要更有影响。”^①在日本后“9·11”小说中,非人化他者主要分为两类,即敌人和平民。在恐怖、暴力与战争的支配下,敌人被视作非人化他者的情况极易出现,即出于对敌对方的愤怒和仇恨,一方将另一方视作卑劣低下的非人类,从而无负担、无愧疚地对其进行攻击和杀戮。然而在恐怖、暴力和战争的裹挟下,无辜平民也会沦为非人化他者,美军大肆轰炸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平民的时候,美国“大众却沉湎于娱乐景观,甚少有人思考这场‘正义之战’是否是正义的”^②。无辜平民遭受暴力与迫害,承受精神与肉体的创伤,大量无辜生命在被漠视中陨落。

日本以“9·11”事件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展现了不同环境下敌对方他者的非人化表现。《破碎支离万千像》以“9·11”恐怖袭击为背景,展现了美国和恐怖分子将彼此视为非人化他者的双向对立。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多次宣称发动恐怖袭击的为恶者,必定被惩罚,意在对恐怖分子及相关对象施行暴力和打击。此时,美国出于对“恶”者恐怖分子的憎恨和恼怒,将他们非人化、视作亚人类的动物,对非人化他者使用暴力成为“合法可行”的行为。美国对恐怖分子的非人化过程十分迅速,他们“迅速从一开始的‘人’、到逐渐不那么是‘人’、然后成为几乎完全不是‘人’的‘邪恶’”^③。另一方面,恐怖分子对美国也是极为憎恶和反感的,尽管恐怖袭击引起了美国的勃然大怒,但电视映出的恐怖分子依然叫嚣着“异教徒们都去死”,伊斯兰极端分子视美国人为异教徒,认为“异”的他者都应死去,只有当不视对方为人类才会毫无怜悯和感情地希望对方去死。《和平》以阿富汗民族纷争为背景,展现了塔利班将哈扎拉族军队及其首领视作非人化他者所实施的暴行,蕾拉的父亲作为哈扎拉族军队的首领,被塔利班掌握其住处后抓获,最终在白天人来人往的路边被杀害。《巴格达的擦鞋工》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展现了美军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这一类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和因家园丧失、亲人被害而憎恨、抗拒美军并视其为非人化他者的对立组。由于感受到恐怖分子的棘手,美国占领军对巴格达各地区展开了突然的歼灭战,所有被怀疑为抵抗美国占领军的人皆被投入阿布格莱布监狱,文本显示这导致仅巴格达就有一万人下落不明。这些下落不明的人结局大多是饱受折磨而死亡,他们被美国占领军视作麻烦的敌人,尽管其中大多数人可能是清白的,但被视为非人类的他们自然得不到清白的认同,还被无情地施以酷刑直至死亡。另一方面,由于伊拉克战争导致众多当地人流离失所、失去至亲,当地抵抗组织所张贴的海报和分发的传单上写有“侵略者美国,去死!”一类的话语,以及主人公艾哈迈德表明“我不杀人,绝对不杀人类,我要杀的是侵略者们,只杀侵略者”,伊拉克当地人对侵略者美国亦充满仇恨,认为作为侵略者的他们已不属于人类范畴,只希望这一可恨的他者永远地死去。

日本后“9·11”小说中有大量无辜平民遭受残忍迫害、暴力攻击以及因恐怖袭击和战争而无端丧失生命的情节描述。《破碎支离万千像》中,“9·11”恐怖袭击致使众多美国民众无端丧生;《和平》中,阿富汗平民被塔利班以莫须有的理由逮捕,持续遭受“拷问、暴力与迫害”,而塔利班对于哈扎拉族人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更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此外在阿富汗战争中,更有为数众多的、包括无辜女性和儿童在内的阿富汗平民丧生于美军的空袭;《巴格达的擦鞋工》中,主人公艾哈迈德的腿被美国士兵

^①Johan M G, Van der Dennen. *The Origin of War: The Evolution of a Male-Coalitional Reproductive Strategy*(Vol. II). Groningen: Origin Press, 1995, p. 442.

^②池慧仪,杨金才:《〈零〉:后“9·11”美国的忧郁与哀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③潘亚玲:《“9·11”后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建构》,《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射穿,奶奶和两个妹妹因美军导弹的误射而血肉横飞,叔叔被美国士兵带走拷问,归来时已是一具尸体,母亲被美军的流弹击中失去生命,此外还有其他伊拉克平民被美军射杀或拷问致死。恐怖袭击、阿富汗民族纷争以及两场反恐战争“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与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灾难”^①,无辜的平民在压倒性的暴力下最终沦为不幸的非人化他者。

在恐怖、暴力与战争的支配下,他者被漠视而成为非人化的动物,身为人类的他者变成了非人类的存在,被“合法地”施以暴力和杀戮。然而,“脆弱特质应当是人类所共有的属性”^②,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应被施以无人道的暴力和迫害。此外,冲突与战争使其支配下的民众承受着地狱般的磨难,而暴力带来暴力、复仇引来复仇、憎恨孕育憎恨,若不为此寻找一个切口,人类将陷入永无止境的暴力与战争的闭环之中,而其灾难性的结果也将由人类自行承受。

结语

包含了他者声音和视角的文学历史记忆才会更全面、更客观,因此文学在实现记录并保存历史的功能时,应努力避免单方化和片面化,不能仅允许一方发声,而是要倾听来自不同主体的多种声音,尤要关注那些易被忽视的他者。日本后“9·11”小说通过对差异性他者、边缘性他者、非人化他者的关注与书写,呈现了他者书写他者中“他者”的认知、话语与意涵的多重越境变奏。日本后“9·11”小说通过关注恐怖袭击与战争暴力下他者的困境、磨难和创伤,帮助他者进行话语表达和历史记录,既弥补了欧美后“9·11”文学对他者关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又使有关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的历史记忆更加客观和全面。“9·11”恐怖袭击事件与两场反恐战争带给人们的冲击和震撼早已冲破时空之壁,化为人类共有的记忆,这些记忆虽是人类历史上惨痛且沉重的经历,但绝不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问题,也是现在需要不断思考和反省的问题,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以更多元的文学视角来释读并记录这些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性事件,通过对过去的反思警示后人,让个体和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后“9·11”小说无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研究对象。

The Conversion of Japanese Post-9/11 Novels: Writing of the Other and the Other's Writing

YANG Hongjun & WANG We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 Japanese post-9/11 novels have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ther since their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ors, they stand at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9/11, the War on Terror, and the epicenter of the accident. Their writing stance is relatively objective. From the object of concern, they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European and American groups, especially American groups, and pay attention to more related subjects. From the characterization, they focus on “little people” groups, rather than the heroes, terrorists and other central figures of the event. The novel depicts the terrorist attack and its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ial Others, marginal Others, and dehumanized Others, showing the plight of the Other under terror, violence and war, giving a voice to the neglected and forgotten group of Others in the accident, and presenting the multiple conversion in the cognition, words and meaning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the Other by the Other.

Key words: Japanese post-9/11 novels; the Other; difference; marginality; dehumanization

(责任编辑 曾小明)

^①张和龙:《“9·11文学”:新世纪美英文学的审美转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②胡亚敏:《战争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年版,第190页。